

# 插增本《水浒传》的搜寻研究与郑振铎先生的筚路之功 ——兼述《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新发现的残叶

艾俊川

【摘要】郑振铎先生是《水浒传》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在文献收集抢救、资料出版和研究方面均作出重要贡献。他最早从国外图书馆发现“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并开创了研究进程。几十年来，海内外学者对“插增本”进行了多方搜寻和深入研究，并藉此在简本《水浒传》和繁、简本关系等方面取得研究成果。最新从英国发现的23页插增本残叶，可能来自德国斯图加特藏本，是古本《水浒传》资料方面的新发现，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郑振铎 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 插增本 水浒传

## 一、郑振铎是《水浒传》研究的重要奠基人

郑振铎先生在《水浒传》研究中的贡献，与他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贡献是一致的，就是集收藏、出版与研究于一身。他在水浒文献收集抢救、相关资料出版和《水浒传》研究中做的很多工作，都带有奠基性质，至今沾溉学林，影响深远。

在收藏方面，郑振铎藏有《水浒传》小说及续书、图像等多部，《西谛书目》中著录《水浒传》及相关书29种，除去续书和仅存图目者，有繁、简本《水浒传》16种，其中一些版本是绝无仅有的，如嘉靖本《忠义水浒传》残卷，是现存最早的《水浒传》文本。又如容与堂本《忠义水浒传》、袁无涯本《忠义水浒全书》以及大涤余人序本《忠义水浒传》即所谓李玄伯旧本，都是罕见的秘籍，也是研究《水浒传》必读的本子。郑氏藏书早已化私为公，今天我们能利用这些珍贵版本从事研究，不得不感谢先生多年搜求之功，叹服他的眼力和学识。

在出版方面，1953年，郑振铎主持编校出版了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为以后几十年的水浒研究提供了标准文本。他还影印出版了《水浒叶子》等古代水浒人物版画，虽然列入版画史丛刊，但同样为水浒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图像资料。

在《水浒传》研究方面，郑振铎无疑是先行者之一。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对包括《水浒传》在内的中国小说刚刚起步，研究者只有鲁迅、胡适等寥寥几位。1927年，郑振铎发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其中介绍了10种版本的《水浒传》。在水浒研究中，无论是搜寻国外藏本、还是罗列大量版本，郑振铎的工作都首开先河。1929年，郑振铎发表了《水浒传的演化》一文，对很多重要问题做了深入研究，成为水浒研究的奠基性著作。1953年，郑振铎为新编《水浒全传》写序，对有关问题进行再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此外，他还写下一些与《水浒传》有关的题跋。郑振铎关于《水浒传》的这些论述，至今仍是水浒研究者的必读文献。

## 二、郑振铎最先发现并研究插增本《水浒传》

1927年夏，郑振铎先生游历欧洲，到各国的重要图书馆中，阅读他们收藏的中国书，尤其是小说与戏曲。他先到法国，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见到了不少中国小说与戏曲，这让他大喜过望，立即修改行程，在本想只住几天的巴黎竟流连了几个月。

郑振铎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看到十部《水浒传》，除去文字相同的，共有五种不同的本子，其中最让他惊喜的，是《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这也是中外研究者第一次看到“插增本”——以插增故事

为标榜的《水浒传》。

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中，郑振铎说<sup>1</sup>：

《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全书不知若干卷，若干回，仅残存第二十卷全卷及二十一卷半卷。所叙为王庆的始末，仅至宋江起兵征伐王庆，连克坚城为止，未及王庆的灭亡。但这一本书，虽为零星残缺的剩本，却有无比的高价，可信为现存的《水浒传》中最古的一个刻本。全书一页分为上下两截，上截占全页面积三分之一，是插图，下截占全页面积三分之二，是文字。像这样形式的刻本，是很古远的，大约是南宋末叶很流行的式样；阮氏翻刻的宋本《列女传》是如此，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几部古代平话，如《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书》也是如此，惟不能断定究为元和明的刻本。（但至迟不能在万历之后，不列颠博物馆藏有一本《万历壬辰书林余氏双峰堂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亦每页有图有文，正与此相同，惟每页分三格，第一格有评语，与此略异而已。万历以后，这种版式便不大看见了。）……

我很想把这残本影印出来，这真是一部珍秘的古书，值得研究的。至少，我们在这里可以晓得：（1）《水浒传》是很早便有很完备的本子流传于世了；（2）《水浒传》的故事是时时为无名作家所“插增”的；这个残本，便是以“插增田虎王庆”的故事为号召的。

发现这样一部《水浒传》，郑振铎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当时，人们看到的《水浒传》多为清代版本，几部明末刻本还未被发现，嘉靖残本更是不为世人所知，说这部残本“可信为现存的《水浒传》中最古的一个刻本”，并无不妥。即使在今天，即使有嘉靖残本，这部“插增本”所存内容仍是现存《水浒传》中最古的，因为二本文字并不交叉。惟认为该本或早至元代，后来从文本、字体、版式等方面看不大可能。两年后，郑振铎自己修正了对此书版本的想法。

1929年，郑振铎在《水浒传的演化》中论及“全本”，即增加了田虎王庆，故事最全、的本子，将插增本列为第一种：

在这些全本之中，最先出现的最重要的乃是《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这一部书的出现是极重要的事实。这部《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其版式与余氏双峰堂所刊的《三国志传》完全相同，上格为图，下格为文字，纸张也是相同的，可证其为同一的刊本。……余氏刻书的时代是万历之间，这部《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想亦出于这个时候。此书以“插增田虎王庆”为号召，且见之于标题，可见这两大段的故事是到了余氏方才“插增”进去的。这两段故事，在万历之前，全不见于《水浒传》中。余氏大约因为读者喜欢《水浒》的多，所以特别的自编了这两大套的水浒故事进去，以示别于他本。这一个“全本”一出版，便要推翻了一切的以前出版的罗氏本、郭氏本。“水浒故事”的演变，至此始宣告完成。……这个第一部的“全本”乃是后来各简本的“祖本”。凡简本叙到田虎、王庆两大段的故事时，便直抄这一个本子，没有什么增删。……

巴黎所藏的这部书，只残存一卷多一点，三十三叶。对全书的情况，只能推测。郑振铎认为，对此“插增本”的内容，可知者有以下几项：

一是以插增田虎、王庆二大段的故事为号召；二是改了罗氏原本的分卷分则的格式，而变为回目；三是从郭氏繁本中取出征辽的一段来，加以删节，并入罗氏原本中；四是除了插增征辽及田虎、王庆故事，以及改“则”“卷”为“回”之外，其余的内容文字与罗氏原本大概是相同的；五是在刊印此书的时候，有可能偶然采取郭本的长处，特别是原本所无，而郭本所有的诗词；六是余本插图很精美，但刊印则颇不经心。

从后来的研究成果看，郑振铎上述观点得失兼具。从现存资料看，认为标榜“插增”的本子是第一部“全本”，后来的简本都以它为“祖本”，是成立的。因为现存的简本内容不出

这个范围。但具体到巴黎所藏的后来被称为“插增本”的本子，是不是同类型文本的第一个刻本，还需要深入研究。更值得商榷的是，将插增本定为万历年余氏双峰堂所刻，并无直接依据。郑振铎当时这样认定，是

因此书上图下文，与余氏所刻其他书特别是《三国志传》类似，故推测此书同为余氏所刻。余氏在万历二十二年确实刊刻过《水浒传》，也插增了田虎、王庆故事，而且版式是上评中图下文的，与《三国志传》全同，但那部书后来在日本日光轮王寺发现了全本，名字叫《京本增补校正全像水浒传传评林》，并于 50 年代影印行世。插增本本身没提供版本信息，复与余氏刻本书名、内容不同，版式也有差异，无法确定是否同为余氏所刻。如此，插增田王故事始于余象斗等推论也就失去基础。

在二十年代，郑振铎持“简先繁后”论，认为繁本《水浒传》是在简本的基础上扩充发展出来的，所以他对插增本给予高度重视。后来他的观点发生变化，不再认为简先繁后，对插增本的价值也不像原来那样强调。1953 年他主持《水浒全传》校勘工作，认为插增本等简本都是繁本的删余之物，错讹不堪，没有把它列入参校本。

### 三、八十年间水浒学者对插增本的搜寻和研究

虽然巴黎藏插增本《水浒传》只剩下断册残篇，而且内容局限于征田虎、王庆的插增部分，但它是现存最早的简本《水浒传》，又是最早出现田王故事的《水浒传》，因此在郑振铎发现并初步研究之后，它们也受到后来学者的关注。此本孤藏海外，利用不便，此后国内的研究主要是转述郑振铎的见闻和论点，对照实物的研究则有外国汉学家在进行。法国学者戴密微、日本学者白木直也在五、六十年代都有相关论文问世。这期间，藏于英国牛津大学的一页插增本残叶也被发现，对插增本的研究范围有所扩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插增本研究获得突破。夏威夷大学的马幼垣教授，穷数年之力，在各国学者的帮助下，遍询世界上几百家图书馆，在欧洲又发现了几册插增本的残本<sup>11</sup>。其中有二册与巴黎藏本板式相同，即每叶有二张插图，每个半叶都有一张，一藏哥本哈根丹麦皇家图书馆，内容存招安、征辽和征田虎，与巴黎本相邻而不重复。一藏西德斯图加特州立瓦登堡图书馆，内容存自林冲刺配至清风寨花荣捉秦明，中有缺叶。同时学者们还发现了另一个版本的简本《水浒传》，其中一卷书名为《新刻全本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传》，同样以插增田王故事为号召，文本与上述插增本属同一个系统，但每叶只得一个插图，即前半叶无图后半叶有图，也有二册，一藏梵蒂冈教廷图书馆，一藏东德德累斯顿的邦立萨克森图书馆。它们是一部书分拆开的二册，合起来正好存相对完整的三十九回，包括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直至全书终结。为研究方便，马幼垣按发现时间的先后，将每叶二图的本子称为插增甲本，将每叶一图的本子称为插增乙本。

随后马幼垣对两种插增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陆续发表研究成果，最终收入《水浒论衡》与《水浒二论》两书，并将同属插增本系统的插增甲本、插增乙本和余氏刻《水浒传传评林》本的文字进行对勘，于 2004 年出版了《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

马幼垣认为，在欧洲发现的插增甲本残册与残叶，原属同一部书。该书很可能在 1600 年稍后，由荷兰战船经澳门带到欧洲，并在 1605 年被书商分拆拍卖，从而流散欧洲各地。现存的三种插增本（包括《评林》本）同出一源，其源头只可能是一部简本。简本是由繁本删节而来的。这三种本子都不是首次出现的简本，其中，插增乙本更接近原始简本。

此后，马幼垣对插增本的研究暂告一段落，并表示暂时放弃对世上可能存在的插增本剩余残本的搜寻。

### 四、新发现的 23 张插增本残叶

2007 年底，我浏览英国的一家购物网站，看到一家杂货店出售一本剪贴成册的汉文书，上图下文，自称是日本武士版画。他提供的几张图片很小，但勉强可以认出林冲、朱贵等人名。从文字和纸色看，我认为这是一部旧刻《水浒传》的残页，但无法确定是中国刻本还是日本刻本。好在卖家要价不高，我将它买了回来。

残叶共有 23 张，原来的藏书人沿着板框将每半叶图文剪了下来，并裱贴在硬纸上装订成册，因此实际是 23 个半叶，合中国书 11 叶半。版心上的文字信息一字不存。残叶内容多数集中，虽有间断，内容尚可连属，主要为林冲上山和杨志卖刀两大段，少数叶子为靠后的故事。将叶子排好顺序，按照图像的题目，存如下内容，其中一叶卷端有大题，另存三回回目。

林冲管住草料场  
陆谦放火烧草场

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卷之三  
第十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林冲醉卧雪堆中  
林冲被捉遇柴进  
林冲逃走梁山泊  
林冲酒店题叹诗  
林冲店内见朱贵  
王伦杜迁见柴进  
王伦要讨投名状  
林冲下山投东去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冲入草 汴梁城杨志卖刀  
杨志大怒赶林冲  
林冲忿力战杨志  
杨志在京卖宝刀  
杨志怒恨杀牛二  
杨志拿刀去首官  
杨志投见梁中书  
周瑾与杨志比箭  
杨志射周瑾落马  
朱仝雷横去捕贼

第十三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庙 晁天王举义东溪村  
雷横庙里投（捉）刘唐

将王婆剐死示众

燕顺置酒待宋江  
花荣计策捉秦明

根据书名、版式和字体纸张特点，在与《古本小说丛刊》中影印的巴黎藏插增本对比后，我初步判定这些残叶来自《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即所谓“插增甲本”。

进一步，我将残叶与马幼垣《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中斯图加特藏插增甲本录文对勘<sup>iii</sup>，结果可称“惊人”：这些残叶与斯图加特藏本中的缺叶完全互补，凡是这册里面有的，那册就没有，反之亦是。而那本书里缺的，这里却有好几张。特别是斯图加特藏本中有几回基本完整，只缺半叶，恰恰这册里有几个半叶，正是那本所缺的，文字衔接，若合符契。如“林冲管住草料场”，斯藏本上叶最后是“只是小人家”，此叶开端是“离得远了”；“朱仝雷横去捕贼”，斯藏本上叶最后是“姓雷名横，身長口口口”，此叶开端是“寸”。《评林》本此处作“身長七尺五寸”；“花荣计策捉秦明”，斯藏本上叶最后是“秦明”，此叶开端是“引军赶时”。等等。“巧合”到这种程度，只能有一个解释：新发现的 23 张残叶，就是斯图加特藏本中散出来的。

上面是残叶的基本情况。就文本来说，要指出其特点，必须做马幼垣曾经做过的工作，集中多个本子进行比勘。这项工作现在还没有做，也不是这篇小文的任务。我试取了一点插增本的内容，和容与堂本、评林本对比了一下，除繁简区别外，文字也有差异。

林冲在朱贵酒店题诗，插增本残叶是八句五言：

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江湖驰名望，慷慨聚英雄。身世浮萍梗，功名类转蓬。他年若得志，威镇在山东。

容与堂本也是八句五言：

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江湖驰闻望，慷慨聚英雄。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

评林本却是四句七言：

仗义林冲最朴忠，驰名慷慨聚英雄。身世今如浮萍梗，他年得志镇山东。

在诗体字数上，插增本与容与堂本相同，但有三处异文：“驰名望”与“驰闻望”、“浮萍梗”与“悲浮梗”、“在山东”与“泰山东”。评林本与插增本诗体不同，这三处文字却相同。至少就“威镇在山东”与“威镇泰山东”而言，前者优于后者，因为梁山泊分明在泰山之西也。所以插增本虽然是删节本，仍然有其版本上的价值。

如果马幼垣教授的推论成立，插增本《水浒传》早在 1600 年前后就远赴欧洲，那么至今已 400 余年。在流散 400 年后，它能以偶然的会重归故里，也算得上是一段书林佳话，想亦为郑振铎先生在天之灵所乐见。

## 五、余论 从商业竞争角度看插增本

繁本与简本孰先孰后之辩，是水浒研究中的根本性问题。通过对插增本的研究，此问题的脉络已大致清楚。简本系由繁本删节而来，看来更有根据。一些枝节问题，如为何简本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插图版式为何如此多样、插增甲本和乙本谁先谁后、现存的插增本离原始简本有多远，等等，还可以继续探讨。从书坊的商业竞争行为角度来寻找答案，不失为一条路径。

从明末到清初，当时的读者在谈到《水浒传》时，多对闽中坊贾胡乱删削痛心疾首。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sup>iv</sup>：

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

钱希言《戏瑕》：

今坊间刻本，是郭武定删后书矣。郭故是附注大僚，其于词家风马，故奇文悉被划薙，真施氏之罪人也……

周亮工《因树屋书影》：

予见建阳书坊中所刻诸书，节缩纸本，求其易售，诸书多被刊落。此书亦建阳书坊翻刻时刊落者。六十年前，白下、吴门、虎林三地书未盛行，世所传者，独建阳本耳。

他们都是明代《水浒传》书籍市场的亲历者，无不将《水浒传》删削之过归于闽贾。推原当时情形，也应如此。《水浒传》在明代后期风靡天下，成为畅销书，当然也引来坊贾竞相翻刻，展开激烈市场竞争。按照市场法则，无论古今，一家企业要在竞争中胜出，无非采取几种手段：尽量压低成本、提高质量、多做广告。

刻书的成本有几大块：刻板材料费、工钱和纸墨成本，这些都是硬成本，很难压缩。在竞争压力下非要减少支出，只能偷工减料，反映在书中就是大量删节文字。一味地删节也不是办法，早晚读者会不买帐，还需要增加产品功能，提高附加值。现在看来，书贾们的办法是在书的厚薄大小保持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增加图像和故事情节。在插图、增文方面也有竞争，你每叶插一张图，我就插二张；你增加了田虎、王庆故事，我就增加诗词评论，所有这些挤占了版面，只好再删削文字。所以，在插增本系统的三种书中，乙本每叶一图，文字最详；甲本每叶二图，详略居中；评林本每叶二图之外还增加评论一栏，所以正文最略。可以看出，插增甲本比乙本多增图像，在产品形态上更先进一些，其刊刻时间应晚于乙本，这与马幼垣通过文字比勘得出的结论也可以相互印证。

坊刻书籍的书名，往往就是书贾的广告。他要把自己产品增加的功能，通过书名告诉读者。因此从书名中也可以推断出该产品形态处于何种阶段。试看《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书贾标榜的附加功能比起《忠义水浒传》来，至少增加了几个项目：全、插增田虎王庆、全像、京本。也就是说，依次减去这几个项目，就将比较接近原始文本。插增本复杂的书名，表明其已是文本演进的后期形态，不可能是《水浒传》早期祖本。

《评林》本序言上栏有一则《水浒辨》，称“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馀副，全像者只一家，前像板字中差讹，其板蒙旧，惟三槐堂一副，省诗去词，不便观诵。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去，恐观者言其省漏，皆记上层。前后廿馀卷，一言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显然，这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广告。但据里面透露出的信息，在当时书业，把每个半叶一图的书叫作“全像本”，把两个半叶一图的书叫作“偏像本”，把画像置于书前的，叫作“前像本”。当万历二十二年，闽中书坊有“偏像本”书版十馀副，“全像本”却只有一副，显然是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所以双峰堂选择“全像”版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把“插增甲本”称为“全像插增本”，把“插增乙本”称为“偏像插增本”，倒是更贴切一些。

<sup>i</sup> 本文中所引郑振铎观点见《郑振铎全集》卷4-6的有关章节。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sup>ii</sup> 马幼垣对插增本的搜寻与研究，具见其所著《水浒论衡》、《水浒二论》中的相关章节。三联书店，2007。

<sup>iii</sup> 马幼垣：《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2004。

<sup>iv</sup> 以下三则转引自聂绀弩：《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第20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